

中國語音史之展望

鄧 臨 爾

不論就歷史或科學而言，僅僅一些雜亂無章的材料，不經過有系統地組織，便不能形成知識。同一國家之同一時代的歷史，每因寫法之不同而大異。由於各文化及其不同時代的學者，喜好不同的「組織架構」(organizational frames)，遂需不斷地予以重寫。柏克(Becker)「十八世紀哲學家的樂土」(註一)(The Heavenly City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hilosophers)一書，在「組織架構」這方面開拓了新觀念，因而一門嶄新的學問，學術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得以萌芽。其他傾向於哲學研究的史學家，轉而注意到「歷史的詮釋」和「歷史的意義」諸問題，因而一連串的新學問都相繼出現了。

就科學方面而言，與史學的情形相同。一群稱為理論科學家者，貢獻他們的時間和才能於建立理論的架構，以便適當地納入各類素材。他們作成許多便於運用的知識庫房，讓其他科學家存放他們比較具體而實用的成果。去爭辯理論科學和實用科學何者為優這一問題，根本是無聊的。二者有如陰陽，相待相成，不能單獨存在。

語音史(historical linguistics)這門學問，是歷史也是科學。它取用過去的材料，根據語音學底尺度加以組織。在實際運用上，理論形式和實質材料是相互影響的，歷史因素影響到理論形式，理論形式更實實在在地影響到材料底抉擇。語音史和一般的語音學不同，因為它至少要研討兩個時代的語文，所以必須注意到發展和改變。

從搜集材料方面來說，中國語音史正是一個茂盛的熱帶草原。中國大約有四千年連續不斷的文字記載，這與埃及，希臘或近代歐洲都不同。如果以此與最多只有一千年歷史的希臘，羅馬或拜占庭文化相比較，我們將會了解到中國文化的豐富和值得尊重了。中國的經書——學術傳統的中心，在漢朝已具備了現有的形式。這些經書的本身，以及各種不同的註解，統治了中國學術界，長達二千餘年。然而，這些只不過是語言學最粗的材料。中國學者在後漢即已開始分析和運用這些材料。因此，產生了中國最重要的一部字典：許慎底說文解字是在公元一二一年編纂的。單是研究和比較它底不同的版本以及對它所作的各種修正，就需要寫好幾部大書。近代，這方面的最佳本，丁福保所編纂的說文解字詁林，共有七十二冊，幾乎相當於大英百科全書。在字典的傳統上，中國可以說是獨步世界了。

語音學的初步工作——分析音素，或由於印度佛教的影響，在公元一世紀就開始了。它受到文字學的影響，並且和文字學混而為一。聲韻學之最初得到主要的系統化，以公元六〇一年陸法言的《切韻》為開始。自此以後，這些材料不斷得到重新集合，重新編纂，重新估價。因這些都屬於同類材料，我們一概稱之為《切韻系統》(Ch'ieh Yün Chinese)，這就是一千多年來，公認中國語言學最重要的遺產。這些聲韻學的材料，有時由反切，有時由等韻圖保存下來。它最標準的形式，從公元一千零八年起就已確定，即今日衆所知的《廣韻》。

對於這已有一千年歷史聲韻學，近代西方的語言學家僅增加了一套音聲和音素的 (phonetic and phonemic) 符號。高本漢給予切韻系統以一完整而統一的音聲符號，並改稱它為《中古音》(註二)。這對中國語音史的研究是一大鼓勵。董同龢教授在《中國語韻史》(註三)一書中，對於高本漢的符號作了重要的校訂和改正。王力也不僅在一處(註四)作了同樣的工夫。在歐洲，一位德國學者古禪文克 (Guenther Wenck)，在其十年研究日本聲學中，化了部分的時間，作了同樣的工作(註五)。他們在中古音底澄清，統一、和使其材料更為可靠方面都有相當的貢獻。據我的看法，這些虔誠的學者們所作地精密研究，實際上已達到了他們的目的。就中古音整個系統來說，澄清和校訂的路幾乎已經走窮了(註六)。大多數的學者，包括高本漢在內，都默認這個事實。因為他們已開始着手重建較早的一個時期，高本漢稱之為上古音 (Archaic Chinese)。

對於切韻系統整體而言，任何新的研究都不易再有重要貢獻。但我(隨同其他學者)相信，假若針對研究中古音所根據的《預設》(presuppositions) 以及理論架構作一批判的研究，較大的進展和更改仍是可能的。

到底什麼是中古音？中古音是切韻系統所代表的音。然而，什麼是切韻系統呢？它是經過整理而成系統的中國語音。是中國語言學家四百年來研究(從公元七世紀到十一世紀)，聲韻學的結晶。但是，這些中國音真正代表的是什麼？高本漢發出這個問題，並且予以答覆。他認為，根據唐韻的例子和其他語言上的材料，這些音可以說是公元六〇一年長安通行的語言。發出同樣問題的學者愈來愈多，而他們都對高本漢的答案表示懷疑。

賀登崧 (W. Grootaers) 是第一個完全摒棄切韻系統的學者(註七)。他是一個方言專家，專攻語言地理。由於他所接受的訓練和他本性的傾向，他對一切寫成的材料都表示懷疑。一般人對《說》的話是在先而主要的，寫的文字只是後起而次要的，這原理，只當是口號，而他則誠懇的相信着，並且在工作上實際地遵奉它。《切韻》是中國整個文

字傳統的一部份，最多只是次級的材料，所以在運用時必須特別小心（註八）。賀神父認為只有對先在而主要的材料——中國方言，作一更仔細，更有系統的研究才是語言學可靠的根據。所以，他的第一步工作就是從語言地理中繪出語言的地圖（linguistic atlas）。

且馬維勒（P. Demiéville）；對於賀神父大多數的作品都曾仔細研讀並批評過。他在其重要的論文 *Archaïsmes de pronuciation en Chinois Vulgaire*（註九）中，引用賀神父的意見證明切韻系統不足以解釋在現代北平話中許多最普通的字的發展。

現代語言學家，對於這不能確定的「中古音」（Ancient Chinese）都逐漸表示懷疑，王力（註十），王聯曾（註十一）山姆·馬丁（Samuel E. Martin）（註十二）和史汀生（Hugh Stimson）（註十三）都是這群懷疑分子中的人物，他們公開否認中古音是公元六〇一年長安通行的語言。

所以，問題仍舊存在。「什麼是中古音？」在何時何處可以指認它？就我的看法，除非能够找到更滿意的答覆，否則賀神父的路子雖然過於激烈，我們也不能不接受它。

趙蔭棠，在其中原音韻研究一書中（公元一九三六年初版，一九五六年再版）（註十四），指出了一項有關於組織方面的重要原則。他說中國語言從元朝到現在不能視為一單線的發展。在這段時間中有兩種不同的語音，我們一定要能認清楚，能區分開。其中之一，他稱為「曲韻派」，即以詞曲所用的韻為主的一派。另外一派，他稱為「小學派」，即是以研究中國文字學為主的一派。他認為他所研究的韻書是屬於曲韻派的，並且稱這本韻書所記載的語言為「早期官話」。早期官話是說的語言，是關，鄭，馬，白四大家寫劇本在北京舞臺上演所用的語言。它與小學派的韻書大多不同。趙蔭棠創出這套理論，為了避免人家指責他對中原音韻所作語音的重建工作只是傳統小學派的一部分。他只想說明，他所主張的是自然語言——早期官話。但這理論却有更廣的含義。

在一九三〇年龍果夫（Dragunov），一位俄國學者，首先對八思巴字母所拼成的元代語音加以研究（註十五）。這種字母是一位西藏僧人所發明的，用來記錄元朝在亞洲所用的五種語言（註十六）。不幸，由八思巴文所拼出的當時中國音與趙氏所構繪的元代語音並不相同。中國學者或以八思巴文的記載為不可靠，因為他們都不提及這種材料。董同龢和王力在他們的中國語音史中，都未注意這種材料。

最近，一些八思巴文新發現的重要材料，都可以得到了。一九五六年，一位匈牙利學者 L. Ligeti 發表了“Le Po kia sing en ecritüre hp'ags-pa”（註十七）（巴思八文之百家性）一文。去年承 Sir Gerard Clauson 好意把一本極為重要並附有八思巴文的中國韻書攝成照片寄給我（註十八）。不到一年，羅常培和蔡美彪把這本韻書的手抄本刊印

出來，作為搜集八思巴材料的一部分（註十九）。這些都是重要的新材料，使我們對八思巴文所記錄的中國語音的了解增進了不少。在我的研究工作中，我曾經運用過蒙古字韻。不過在運用它時一定要特別謹慎，因為其中有許多符號上的錯誤。這些錯誤必須先行改正，方可供一般使用。

蒙古字韻在公元一三〇八年出版；中原音韻在一三二四年出版。它們出現的時代和地點都大致相同，但是它們所代表的語言却有很大的出入。中原音韻裏的中國音是沒有濁聲母的，而蒙古字韻裏則有濁聲母。中原音韻表示入聲已經歸入其他四聲了，而蒙古字韻裏却保存了獨立的入聲。（但是它並不以 $-p-t-k$ 這種子音收尾，却多半是以 glottal stop 收尾的。）中原音韻的平聲分陰陽，蒙古字韻則只有平聲。

如果沒有趙蔭棠的理論，對這種情形真不知將如何加以解釋。趙氏要我們如何注意將這些材料加以分類，但他所提出的解決此問題的方法，亦未能令人盡信。他認為中原音韻代表元朝的「曲韻派」，蒙古字韻則正好相反，是「小學派」。這表示語韻史的記載應當更加確定。在元代根據曲韻派（或早期官話）濁聲母已經消失了。在元代根據小學派則濁聲母依然存在。

更奇怪的是在朝鮮語裏的漢音也有同樣的情形。楊聯陞在其「老乞大」「朴通事」裏的語法語彙一文（註二十）中，要我們注意元代語音中的兩種會話指南：老乞大諺解和朴通事諺解。老乞大給我們兩種用朝鮮字母拼合中國字音的方法。這兩種拼法大體一致，有時却有重要的出入。在「翻譯老乞大朴通事凡例」中曾解釋說，一種拼法代表「俗音」，一種拼法代表「正音」。正音的拼法是由四聲通考而來。四聲通考是世宗皇帝所出版的四部字典之一，這些字典的出版在使朝鮮人學得一種標準或正確的發音（註二十一）。

世宗是李朝皇帝中最偉大的一個。李朝的皇帝都富於剛毅和決斷；他們剛剛趕走了蒙古人和蒙古人的傀儡而建立獨立的朝鮮。他們的目標是建立一個可以控制全國的強大中央政府。他們運用政治和文化兩種方法去達到這個目的。在許多豐功偉業中，世宗想要統一全國的語言，這時他已與明朝建立起良好的關係，所以他所要求的語言發音要和明朝的相去不遠。朝鮮文字母（Hangul）的發明就是這統一化工作的一部分。至於設立國子監；釐定科舉考試制度以及頒布欽定韻書都是這種統一工作的表現。

在朝鮮文的正音中，還有濁聲母的存在，這正好與明代所頒布的洪武正韻相仿。在正音中入聲還帶着 glottal stop 而在俗音中，不論濁聲和入聲都不存在了。在這裏我們又遇到同時代和同樣可靠的兩種符號，却彼此有出入。這種如何解釋呢？在這裏，我們

似可根據新得到的朝鮮語中的資料，將趙蔭棠的理論略予擴大。趙氏所謂「曲韻派」固代表元時上都舞臺上所用的俗音，但上都俗音並非當時北方的唯一俗音。且其他時代亦必另有俗音。例如燉煌便可能存有此種資料。故趙氏「曲韻派」一名詞不如即稱爲「俗音」。北曲即係此「俗音」中最顯著的。趙氏所謂「小學派」則可改稱爲「標準音」。因蒙古字韻和朝鮮文的正音與洪武正韻都係官訂韻書，係經過校訂的一種「標準音」，用來輔助各該政府進行統一全國工作的。

在強大的李朝時代，朝鮮人提出一套「標準」發音，並且強令通行全國；這套標準發音，與同時代的「俗音」發音不同，但却與中古音相同，包含着濁音。中國，在明朝太祖（洪武）統治之下，也頒訂韻書，強令標準發音通行全國。這套標準發音有濁音，有入聲，而平聲則無陰陽之分。但是中國不是只有一個強大的朝代要想標準化全國的語言。在明朝以前還有宋朝。它的欽定韻書則是廣韻。

現在我們可以回到原來的問題：什麼是中古音？中古音是宋朝的標準語言。它係由一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將中國小學派的聲韻學材料予以改定，爲了要達到了標準化的目的，而強令通行全國的語言。因此標準語言並不像今日的大同話或以前的早期官話一樣是自然語言（這一點非常重要的）。它承接了古的形式，違反了自然語言的特徵，只爲了達到勉強可以統一的目的。因此，中古音絕對不是公元六〇一年長安所通行的語言。

這使得賀神父，席露易（Serruys）和旦馬維勒的見解格外有力。賀神父認爲現代方言較用文字所記載下來的傳統爲優，因爲他所要研究的是自然語言而不是所謂標準語言的半人工語言。原來，對中國語言具有如此決定性之影響力的中古音，在本質上實在只是宋朝的標準語言。它在語音史上的用途很大，因爲它包含了關於中國中部及北部大多數方言之前身的材料。

王力曾對中古音之編纂的假定情形，作了一個有趣的描繪。編輯們用同時間的區分去表示兩個不同時間的樣式——用地域性的區分來表示歷史上的變遷。（高本漢在重建中古音的工作上，也用過同樣的方法，只是他運用了語音的符號來表示。）他們互相研商。在你的方言裏這些字是否同音？當這些字在任何具有代表性的方言裏不同音時，他們在中古音裏也予以區分。當他們發現在古音裏有分別的，他們一定要在現代語言中也找出同樣的分別（註二十二）。「中古音」達到了可予區分的最細的階段，因它係根據各種方言得來的。相反地，任何一種和「中古音」同時的方言，它所包含的聲母必較「中古音」的聲母爲少。而且，根據同時的韻書和詩韻，我們可以知道韻母也必較「中古音」的韻母爲少。他們創立了一種叫做「通」的方法，表示在這裏兩個韻母所有的分別，在寫

詩時可以不顧。換一句話說，所有當時的自然語言都沒有這頒訂的「標準」語言爲複雜。

「標準」語言不是自然語言，當然不能用研究自然語言的方法去研究它；但是這並不表示它完全無用。相反地，在描寫自然語言時它却非常有用。現代北京話或者公元六〇一年長安通行的語言，根據標準語言都可相當滿意地敘述出來。不過只是一個如何替換音值 (phonetic values) 和如何把這些數量繁多而種類複雜的成素用來構造成某種自然語言的問題。「標準」語言有一種超乎時代限制的時質，因爲它可以用來代表一切自然語言。

對這種已經證明爲很有成效的解釋方法我們將更進一步地來闡明它。除了明朝和宋朝的，以外還有沒有其他的「標準」語言？當然有。要尋找它們我們必須尋求強大，統一的朝代，而且是一個朝代較早的時期。盛唐有一本已經共傳的唐韻；隋，多半無疑問地，有陸法言的切韻。不幸的是因爲年代久遠，它們原來的形式已經湮沒了，不過它們的修正版却很普遍。事實上，衆所皆知的廣韻就是唐韻的修正本。而廣韻和唐韻都分別是切韻的修正本。這種缺乏獨創性的情形並不是偶然的。強大的朝代，爲了要強令統一，甚至忌恨過去。如果他們允許古韻書繼續存在的話，人民也許可以提出某些比「標準」語言更老的方言韻書而遵從之。語言學家必須根據統治朝代的觀點來進行研究。就好像只准有一種日曆，也只准有一種「標準」語言。由於寬大和着重實際，中國的皇帝大都儘可能地容納各種不同的方言，但超過限度，標準語言仍要強制通行。

經過了這長久的時間，殘存的自然語言則更是不堪收拾。周德清的中原音韻也許是這方面最重要的文獻了。這本書的創作及其流傳的情形，尚待更審慎的研究。社會歷史學家已經努力了約有半個世紀，想要探求中國歷史中「外族侵入的朝代」和「本國的朝代」其各不相同的型式所具有的意義。很令人奇怪的，這項原則却給中國語音史帶來了光明的前途。「標準」語言在本國朝代的控制之下往往容易加強，因爲當時服從和支持中央政府是愛國的表現。本國的朝代建立起一種考試制度，和根據這種考試制度所建立的學校。「標準」語言成爲「官話」。皇帝們鼓勵藝術。考試則要根據「標準」語言的韻來寫詩。由於中央政府的贊助，於是「標準」語言顯得格外流行。

但在一個「外族侵入的時代」情形就完全不同了。統治者停止舉行科舉考試。他們不信任中國官吏。他們懷疑中國文化。在中國人的眼光裏，皇帝所要強制實行的都是沒有價值的。他們現在開始盡量反對中央政府，以爲這才是愛國的表現。中國人以講本地話，服從本地習俗爲榮耀，或願忠於前朝的標準語言。

元朝是一外族侵入的朝代。曲取代詩的地位而成爲大眾喜好的通俗文學。北平舞臺

上的文藝復興幾乎可以說與英國的伊利莎伯時代相仿。戲劇的形式之一稱為北曲的，產生了四位傑出的戲曲家，成為他們時代的寵兒。周德清把他們的音律記錄下來使得與他同時的作家可以同樣用這種極為大衆化的形式來寫曲。但這却是對中央政府乃至其所提倡之標準語言的一大反動，這種情形在一個本國的朝代中是根本不許可的。在一個外族侵入的朝代中，一個真正的中國人是支持地方上的差異來反對中央權威。在一個本國的朝代中，一個真正的中國人則必定支持中央政府所強制實行的統一政策。

這個事實給予我們一條很重要的線索。如果我們要研究的「標準」語言，我們應當從強大的本國朝代中去找。如果我們要研究自然語言，我們應當先從外族侵入的朝代或全國混亂的時期中去找。傳統的中國語言學家有一些他們稱為「平水韻」的語言材料。平水是一個地名，它代表一種北方語言的形式，與「中古音」有許多不同的地方。現在我們可以簡單地介紹一下「平水韻」。它們代表中國北方平水地區的語言，那時這片土地正好被金人佔領，廣韻則隨着宋朝逃亡到南方去了。在金人統治之下，中國的地方語言得到了發展的機遇。平水韻就是當時所保存下來的語言記錄。如果這些記錄的本身够清楚，而其分量够豐富的話，應該把它們和「中古音」比照來研究。這樣，可以獲得中國北方方言中較早期官話還要早一世紀以上的語音知識。

日本的吳音(Go-on)也許最初起源於南方的自然語言，這種語言因為用作佛教宣教的工具而被人所尊重。它的時代約在漢隋之間。日本的漢音(Kan-on)，正好相反，代表很晚的「標準」語言。吳音沒有保存中國，很可能是因為後來統一的中央政府把它湮沒了。它保存在日本則是因為佛教的緣故，中國皇帝或許也因為鞭長莫及而無可奈何了。

我所敘述的這套整個中國聲韻學遺產的新理論，提供了許多新觀點，可以鼓勵學者們重新來研究中國語音史的問題。(一)現代對於今日方言的研究，儘量避開標準語言的影響，譬如賀神父所提倡的、在臺灣的中央研究院和國內其他方面繼續加以研究的，都是有價值的工作。(二)在中國文化傳統中仔細地去尋找自然語言的證據是另一條可以發展的途徑。(三)更加精細地去解析中古音則是另一條重要的途徑。

最後這一點還需要加以說明。混合是「標準」語言的一大特性。它的混合是故意造成的，因為編者們想要使它的容受量盡可能的廣博以適應全國各地的需要。這個混合體包括些什麼成素？有那些是可以確定的？我們可否由這人造的「標準」語言中，窺見任何一種自然語言的端倪？直至今日還沒有人作過這樣的研究，而我認為這是很值得一試的。

廣韻中包括許多讀音有兩種、三種而意義不變的字；比我們所知道的任何自然語言

來得多，也比我們認為自然語言所應有的來得多。有時候我們可以確定這些讀音之一是這個字的古音。〔定〕這個字在廣韻中有兩種讀法；一種含有濁音母，一種不含濁聲母。老乞大給予這個字以二種讀法；俗音中含着清聲母而正音則含着濁聲母。只有濁聲母這種讀法才可以作為二種韓文中漢字讀法的祖先。（按韓文中之漢文為 Sino-Korean）因此，我們可以確定有濁聲母的是古形式；而有清聲母的是由濁音所變過來的。我們知道濁音的消失並不是在中國各處同時發生的。廣韻可以證明在公元一〇〇六年中國有些地方濁音已經開始消失了，而在有些地方老的濁音母仍舊存在。

對於切韻系統單個音素逐漸加以精密的研究正在增加，且值得我們特別加以注意。敦煌的材料中保存了現在所保存的切韻中最早的版本——切韻殘卷。這些材料的出版提供了許多新的參考資料，可以開拓新的研究途徑（註二十三）。故宮博物院也提供了一新且重要的切韻版本（註二十四）。臺灣和大陸都印行了韻鏡的新版本（唐末或宋初的韻圖，屬於切韻系統）。臺灣的版本是由董同龢的一位學生所編，其中包括了許多非常有用的注解（註二十五）。周法高的玄應反切考（註二十六），仔細地研究分析了與切韻同時的語音材料，供給我們許多獨到的見解。應裕康的〔廣韻集韻切語上字異同考〕係就切韻系本身來比較。謝雲飛的〔經典釋文異音聲類考〕亦提出了一個與切韻同時而獨立的看法。

不論在這些方面或其他方面，經常有人在搜集材料。新的解釋把這些材料擺在更寬廣的理論結構中，為搜集材料和提供解釋鋪下了更平坦而廣闊的大道。

（註 一） Carl L. Becker: *The Heavenly City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hilosophers* Yale Press, New Haven, 1932-1957, 1-168 pp.

（註 二） Karlgren's studies began with his thesis, *E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 Leyden, Stockholm 1915-1926, 1-700 pp. continued through his *Analyt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 and culminated in his *Grammata Serica* BMFEA 12 (1940) Its newest revision is *Grammata Serica Recensa* BMFEA 29 (1957) 1:332 pp.

（註 三） 董同龢：中國語音史，臺北，一九五三，——一九〇頁。

（註 四） 王力：漢語音韻學，北平，一九五六，——六八二頁，
王力：漢語史稿，上冊（語音）北平，一九五七。

（註 五） Guenther Wenck: *Japanische Phonetik*, Harrassowitz, Weisbaden, vol. 1 (1954), vol. 2 (1954), vol. 3 (1957), vol. 4 (1959). See especially vol. 3: *Die Phonetik des Sino-Japanische*, 1-411 pp.

（註 六） However, these corrections should all be incorporated into a new revision of

Grammata Serica Recensa or *Kuang Yun Sheng Hsi* for easy reference.

- (註 七) See especially William A. Grootaers: "La géographie linguistique du chinois: Nécessité d'une nouvelle méthode pour l'étude linguistique du chinois:" *Moumumenta Serica* 8 (Peking, 1943) pp 103-166. But this is a consistent theme in all his articles.
- (註 八) Most recently in "Linguistic Geography of the Hsuan-hua region, Chahar Province" in *Studies Presented to Chao Yuan-Jen on his 65 th Birthday*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vol 29 (1957) pp 50-90 Note especially, "Chapter 5: What character would you write for the Dragonfly?" and "Chapter 6: The birth of a fifth tone---the bat".
- (註 九) P Demieville: "Archaismes de prononciation du en Chinois vulgaire" *Toung Pao* 40 (1950) pp 1-59.
- (註 十) 王力: 漢語史稿, 上冊, 北平, 一九五七, 一一—二〇九頁, 見49頁。
- (註十一) Wang Lien-tseug: "Un Dictionnaire phonologique des T'ang: le Ts'ie Yun corrige et complété de Wang Jen-Hiu" *Toung Pao* (1957) 51-150 pp. See page 144.
- (註十二) Samuel E. Martin: The Phonemes of Ancient Chinese, Supplement to JAOS 16 (1953) 1-46 pp. See page 4.
- (註十三) Hugh Stimson: The Chung Yuan Yin Yun, A Study in an Early Mandarin Phonological System, Yale University PhD Dissertation, 1959, 1-148 pp. See especially page 9 and Note 19.
- (註十四) 趙蔭棠: 中原音韻研究, 商務印書館, 上海, 一九三六, 一一—二九八頁。
- (註十五) A. Dragunov: "The hP'ags-pa Script and ancient Mandarin" Bulletin de l'Academic des science de l'URSS, Classe des Humanites, pp 624-647 and 775-797.
- (註十六) For the most recent discussion of the hP'ags-pa alphabet see Nicholas Poppe and John R. Krueger: *The Mongolian Monuments in hP'ags-pa Script* Harrassowitz, Weisbaden, 1957, pp 1-147, and Gerard Clauson: "The hP'ags-pa Alphabet" *BSOAS* 22 (1959) pp 300-323.
- (註十七) L. Ligeti: "Le Po Kia sing en ecriture hP'ags-pa" *Acta Orientalia Hungarica* vol. vi, 1956, pp 1-52.
- (註十八) This is my first opportunity publicly to thank Sir Gerard Clauson for his kindness in arranging for photographs of the British Museum copy (which

must be the only one in existence) to be sent to me. He has demonstrated not only that he is a scholar, but also a gentleman.

- (註十九) 羅常培, 蔡美彪: 八思巴與元代漢語 (材料彙集) 北平, 一九五九, 一一一一二八頁。
- (註二十) 楊聯陞: 老乞大朴通事裏的語法語彙, 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二九期 (一九五七) 臺北, 一九七——二〇八頁,
- (註二一) For specific details see Lee Sung-myeong "King Sejong's policy in Seoul Language"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1 #2 Seoul (1958) 29-83 pp.
- (註二二) 王力: 漢語史稿, 上冊, 北平, 一九五七, 四九——五十頁。
- (註二三) 最近出版者爲姜亮夫: 瀛涯敦煌韻輯, 上海, 一九五五。
- (註二四) 王仁昫: 刊謬補闕切韻, 北平, 故宮博物院, 一九四七。
- (註二五) 龍宇純: 韻鏡校注, 臺北, 一九六〇, 一一——三一八頁。
- (註二六) 周法高: 玄應反切考, 國立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二十本, 民國三十七年, 商務印務館。據聞周氏已把該文收入其將於近日出版之一書中。
- (本篇之寫成中文, 杜維明君之力居多, 董同龢教授曾改正幾個專用名詞: 一併誌謝於此。Paul B. Denlinger.)

New Ideas for Chinese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fter a resume of the status of Chinese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nd an appreciation of the work of the best scholars in this field in this generation, the writer suggests that the concept of "standard" language, as something in opposition to various colloquials of differing places and periods, might make the organization of materials simpler and clearer. Chao Yin-t'ang's treatment of the Chung Yüan Yin Yün is adaptable to such a treatment, and Sino-Korean materials must be handled in this way. Kuang Yün is a perfect example of a "standard" language, and Chung Yüan Yin Yün cannot be fitted into an historical context except in terms of a colloquial language. If this proves useful, the basic materials in the field will have to be analysed and classified with reference to this standard-colloquial contrast.